全球對話 6.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4期，以16種語言刊出

找回W.E.B. Du Bois

Aldon Morris

社會運動研究的多元主義

Donatella della Porta

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學

Sari Hanafi

中東的政治
> 黎巴嫩的垃圾危機
> 常態化極端暴力
> 保護平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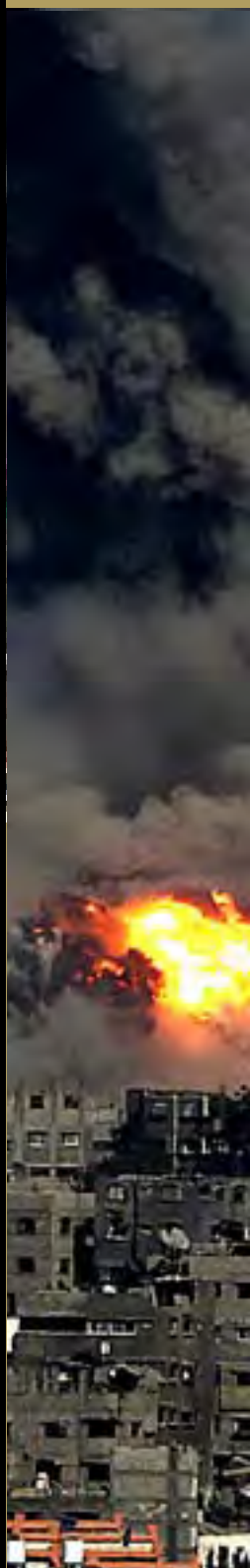
共產主義後的社會學
> 在不人性的世界中保有人性

奧地利ISA論壇
> 邁向在地，邁向世界
> 奧地利專題

特輯
> 社會學和氣候變遷
> 印度的自由和暴力
> 研究寫作
> 介紹哈薩克團隊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D 第6卷 / 第2期 /2016.6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 主編的話

邊緣來的社會學

最有創意的社會學通常來自學術界的邊緣，而且有時候甚至是來自學科之外。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W.E.B. Du Bois。Du Bois可能是美國社會學家中最重要的一號人物，其影響力遍及全球。Aldon Morris的新書：《The Scholar Denied》就是紀錄Du Bois的歷史。Morris說明了這位在德國和Harvard接受訓練的非裔美國社會學家建立了亞特蘭大學派，其科學和嚴謹的程度遠勝於空洞的芝加哥學派。若不是學術界普遍在著種族主義的話，Du Bois會被認為是美國社會學的創立者。但是因為他不被學術界承認，他只好成為的編輯和評論家，並寫出了最重要的關於種族和階級的書，以及關於種族主義的主體經驗，泛非洲主義，以及美國帝國主義。

這期我們也有來自其他邊緣的社會學代表。Dmitri Shalin討論Vladimir Yadov的勇氣與正直如何和蘇聯政權交手，以及對後蘇聯時期的社會願景。Sari Hanafi接受了Mohammed El Idrissi的訪談。Hanafi成長於敘利亞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後來到法國取得博士學位，並在Cairo和Ramallah待了很久，直到Beirut才定了下來，並且成立和編輯阿拉伯的社會學期刊：Idafat。他無懼於批判政府，把中東的社會學帶入了一股活力與能量。

Nisrine Chaer精闢地分析了黎巴嫩的垃圾危機和相關的社會運動。Lisa Hajjar和Amitai Etzioni辯論以色列對於黎巴嫩平民的實際和潛在暴力是否具有正當性。

最後是關於國家學會的報導。這期有一系列關於奧地利的文章，包括簡介將在2016年7月10-14日於Vienna舉辦的第三屆ISA論壇，還有四篇由奧地利社會學家寫的研究短文。美國的Riley Dunlap和Robert Brulle則總結了其令人印象深刻的關於美國社會學會氣候變遷專案小組的報導。此外，還有ISA執行委員會和印度社會學家發表的聲明，主要是批評印度學術界的言論自由遭受到的戕害。澳大利亞的Raewyn Connell則寫了一篇其教導年輕社會學者寫作的心得。最後，我們則介紹哈薩克的編輯團隊，他們是全球對話編輯翻譯計畫的成員。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Aldon Morris，傑出的美國社會學家，討論非裔美國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W.E.B. Du Bois如何是美國社會學的建立者。

Donatella della Porta, 義大利社會學家，討論她如何成為一位知名的社會運動研究者。

Sari Hanafi，ISA副會長，阿拉伯社會學期刊主編，談論阿拉伯社會學面對的挑戰。

GD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Amane Hisada, Takashi Kitahara, Takehiro Kitagawa, Satoshi Manabe, Tomomi Ohashira, Yutaro Shimokawa, Masaki Yokota.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Almas Rakhimbayev, Amangeldi Kurmetuly.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Krzysztof Gubański,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ą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ș, Corina Brăgaru, Adriana Bondor, Alexandra Ciocănel, Ana-Maria Ilieș, Ruxandra Iordache, Mihai-Bogdan Marian, Ramona Marinache, Anca Mihai, Oana-Elena Negrea, Ion Daniel Popa, Diana Tihan, Carmen Voinea.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Lyubov' Chernyshova, Anastasija Golovne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邊緣來的社會學 2

> 社會學作為志業

找回W.E.B. Du Bois
by Aldon Morris, 美國 4

社會運動研究的多元主義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 義大利 7

> 中東的社會學和政治

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學：訪談 Sari Hanafi
by Mohammed El Idrissi, 摩洛哥 9

黎巴嫩垃圾危機的生命政治
by Nisrine Chaer, 荷蘭 12

常態化極端暴力：以色列的個案
by Lisa Hajjar, 美國 14

保護人民：回應 Hajjar
by Amitai Etzioni, 美國 18

> 共產主義下的社會學

在不人性的世界中當人：紀念 Vladimir Yadov
by Dmitri N. Shalin, 美國 20

> 奧地利社會學論壇

凝視在地，面向世界
by Brigitte Aulenbacher, Rudolf Richter, and Ida Seljeskog, 奧地利 23

不平等、貧窮、繁榮
by Cornelia Dlabaja, Julia Hofmann, and Alban Knecht, 奧地利 26

社會不平等、難民、「歐洲夢」
by Ruth Abramowski, Benjamin Gröschl, Alan Schink, Désirée Wilke, 奧地利 27

性別平等和奧地利大學
by Kristina Binner and Susanne Kink, 奧地利 29

工作時間和追求更好的生活
by Carina Altreiter, Franz Astleithner, and Theresa Fibich, 奧地利 30

> 特別論壇

社會學和環境變遷
by Riley E. Dunlap and Robert J. Brulle, 美國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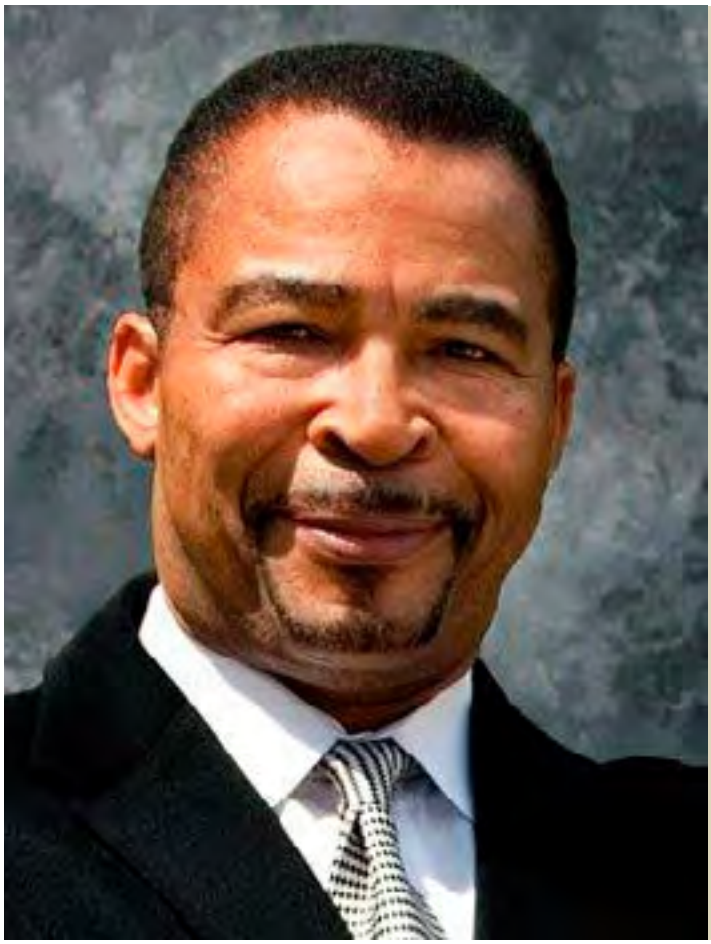
印度的自由和暴力
by ISA 執行委員會 33

研究寫作：邏輯和實作
by Raewyn Connell, 澳洲 35

哈薩克編輯團隊
by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哈薩克 37

> 找回 W.E.B. Du Bois

by Aldon Morr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美國



Aldon Morris的社會運動研究新典範是相當有名的，特別是他得獎的著作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這本書強調了社會抗議的組織和文化基礎。在這篇文章中，他將介紹他被大家期待已久的新書《The Scholar Denie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這本書描述了美國社會學的早年歷史，芝加哥學派的影響，以及亞特蘭大學派的邊緣化。兩位分別的代表人物是Robert Park和非裔的W.E.B. Du Bois。Morris呈現了Du Bois的亞特蘭大學派如何和芝加哥學派分庭抗禮，但是卻不知名。社會學專業內部的種族主義形塑了芝加哥學派的興起和影響了整個社會學的演變。諷刺的是，今天，Du Bois仍然是社會學內外的啟發性人物，而Robert Park則早已被遺忘。以成就來說，W.E.B. Du Bois應該被看成是美國社會學的創建者。

Aldon Morris.

W.E.B. Du Bois 是二十世紀的非裔美國歷史學者、小說家、詩人、公共知識分子、記者、運動者/領導者、社會學家。在所有這些身份之中，Du Bois 最鮮為人知的就是作為一位先驅的社會學者。然而，他總是被認為是一位激進的公共知識分子，並且因為他和保守的非裔美國人領袖 Booker T. Washington 的意識形態鬥爭，而成為非裔美國人的領袖。

然而在我的《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一書中，我認為 Du Bois 發展了美國的第一個社會學的科學學派，也就是 Du Boise 亞特蘭大學派。該學派在二十世紀的最初 20 年是相當蓬勃的。其在亞特蘭大大學發展起來 (現在則是 Clark Atlanta 大學，是一所小型、不富裕的黑人大學)，其成員包括了了黑人學者，大學生，研究生，以及社區領袖。該學派誕生於精英學術界的邊緣，集結了專業和業餘的研究者，其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讓這個弱勢的社群興起了科學的取徑去研究社會。

Du Bois 的專業是具有反叛性格的，因為其從反霸權的種族和社會不平等分析中興起。在那個時代，社會達爾文主義被用來證成種族隔離和歐洲殖民，並且是社會學的主流觀點，然後提供了歐洲和美洲的白人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種族主義在社會和自然科學中是個共識，認為黑人是生物上列等的人種。Du Bois 作為社

>>

會學家則開始去否證種族不平等是生物特徵所造成之結果的說法。他宣稱種族不平等是源自於歧視和壓迫。在他的 Philadelphia Negro 一書中 (1899) 繼續了類似的研究，其經驗證據提供了反駁「科學」種族主義的論述。

《The Scholar Denied》一書紀錄了 Du Bois 對成立研究團隊亞特蘭大社會學研究室以及形成反叛社會學的歷史。和主流社會學不同的是，Du Bois 的學派採用了多重的方法取徑，使用量化和質化方法去推翻黑人劣等論。該學派的創新之處在於用其資料收集的方式是被重要的理論計畫所引導的，那就是找出種族不平等的科學根源，然後推翻主流的社會學說法：黑人天生就劣等。

從這些追求科學知識的努力開始，Du Bois 和其同事開始去找出更廣泛的理論貢獻，論證膚色—長期的白人至上主義造成的社會結構以及被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所支撐—導致了二十世紀初期的種族階層化。以這個觀點，種族是一種社會建構，不是生物類別。在早期的二十世紀，美國社會學家用社會生物學的觀點去解釋社會現實。相反地，Du Bois 使用結構分析，但也承認能動性影響的社會結構，並且可能轉變之。此外，Du Bois 強調若要解釋社會不平等，社會學家必須檢視階級、種族、性別的相互影響。因此，對人類解放的追求必須包同時推翻階級和種族壓迫。

在他早期的著作中，Du Bois 發展出了一個「雙重意識」的概念，把「自我」理論化成是一種人類互動和對話的社會產物，同時也被種族和權力所形塑。關於後者，Du Bois 論證現代性是在非洲奴隸的交易和奴隸制度上所建立起來的，讓勞動力和商品可讓西方布爾喬亞階級所剝削，然後建立資本主義。

美國社會學長期以來就把其科學的傳統追朔到芝加哥大學，據說是那裡白得發亮的教授們發展出了科學的美國社會學，然後才傳播到期他的白人精英大學去的。但是《The Scholar Denied》這本書動搖這種神話般的敘事，呈現了 Du Bois 的亞特蘭大學派怎麼早於芝加哥 20 多年的時間就發展出了科學社會學。雖然是 Du Bois 發展出了科學取徑，但是美國的白人社會學家因為學派的激進想法而倍感威脅，特別是種族的非生物論點，所以動用了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力量去壓制 Du Bois 的觀點將近一個世紀之久。我的書強調了 Du Bois 學派的知識其實是優於芝加哥學派和其他白人先驅的。可是，雖說其想法已經融入主流社會學典範，但整個 20 世紀都不見 Du Bois 的貢獻的討論，並且大家還是把功勞歸給白人社會學家。

Du Bois 的亞特蘭大學派那時必須克服極大的困難。白人社會學家地位是被工業領袖所支持的，因為所謂的「客觀科學」是具有正當性的。但是 Du Bois 卻在著名的大學中被拒絕教授的身份，並且沒有資源做研究。在他的很窮的黑人大學中，Du Bois 領很少很少的薪水，沒有研究費，其激進的想法被監視，且被主流的出版刊物所拒絕。

《The Scholar Denied》一書描述了 Du Bois 的學派如何發展了一種本土的社會學典範，挑戰科學的種族主義。他把他的學派紮根在黑人大學裡面，在那裡用很有限的資源去發展。那些學者、學生、社區領袖等也只領很微薄的薪水去從事研究，有些甚至是志願者。他們和 Du Bois 一起認為科學可以用來抵抗白人至上主義，希望其研究可以帶來自由和解放。

Du Bois 學派利用解放的資本去建立一個本土的社會學。有了社區的支持，該學派是一個 Burawoy 所說的具有「公共社會學的鑲嵌自主性，讓 Du Bois 和其同事可以建立一個特殊的社會學，一個比芝加哥學派更科學的社會學，並且仍然保有歷史哲學的思想上的影響，而且對於現狀更加有批判力」。

亞特蘭大學派並非憑空發生的。相反地，那是一個貼近社會的公共社會學，試圖去根除國家和全球的不平等。早在 1900 年，Du Bois 開始組織泛非洲大會，聚集全世界非洲裔的領袖及學者去檢視如何可以推翻 Jim Crow 法 (美國南方合法化種族隔離的法律) 和殖民體制。在家鄉，Du Bois 幫助組織了 Niagara 運動和美國有色人種權利協會 (NAACP)，兩者都是對抗白人至上主義的。他成立了雜誌 The Crisis，分析性別和階級的壓迫，還有戰爭。Du Bois 的一生是現狀的強力批判者，總是試圖要去找出那些阻礙人類自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

像是 Michael Burawoy 所論證的，社會學若要與社切身相關，那就必須回到其批判的根源。批判地分析權力和人類宰制可以在本土社會學，後殖民社會學，南方理論等中找到。甚至在西方布爾喬亞社會學中向權力說真話的傳統也可以找到。Du Bois 學派提供了 Burawoy 所說的「挑戰主流觀點的實用主義先驅」，這是一個很常常因為被邊緣化而被忽略的貢獻。《The Scholar Denied》描述了社會學知識如何必須是政治的、介入的、嚴謹的，特別是在公共辯論中更是需要如此。的確，賤民社會學必須比那些維護現狀的知識更嚴謹，那是因為這是至關重大的志業。社會學現在仍然忽視了 Du Bois 的重要，因為大家認為他只是「黑人經驗科學」或是處理「黑人議題」而已。但是這種看法大大窄化了 Du Bois 的洞見，他不僅對黑人的研究有貢獻，在理論上和方法論上也是。我書中所提供的證據可以推翻那些短視狹隘的看法，因為我把 Du Bois 和他的學派視為典範，和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等

>>

並駕齊驅，讓社會學可以接上亞特蘭大的傳統，並且拓展社會學的想像。

在該書的結尾，我討論了 Du Bois 學派對於社會學的貢獻的反思。若一個學派可以在一個最慘的時代、恐怖私刑的年代、歧視根深蒂固的社會中紮根，那麼或許這就是一個希望，一個讓那些致力生產可以了解和解放人性之知識的人的希望。

來信寄給 Aldon Morris <amorris@northwestern.edu>

> 社會運動研究的多元主義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Florence, 義大利

Donatella della Porta.

Donatella della Porta是國際知名的社會運動學者，她的著作遍及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和拉丁美洲，並且連結了許多領域，像是社會學和政治科學。她支持方法的多元主義，並且是38本書的作者。她最近的研究涵蓋了政治社會學裡面的許多領域，從政治暴力（《Clandestine Political Violence》, 2013), 抗議的規訓（《Can Democracy be Saved?》 2013), 政治腐敗（《The Hidden Order of Corruption written with Alberto Vannucci》, 2012), 社會運動和民主的關係（《Mobilizing for Democracy》, 2014), 到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回應（《Social Movements in Times of Austerity》, 2015)。她長期以來也投入培育不同國家的年輕學者，到了她成為Florence之Normale Superiore的社會人文研究院院長之後還是持續這樣工作。她也是Cosmos的社會運動研究中心的主任。接下來的文章中，她將闡述其對於社會運動研究的願景和信念。

我的對於社會運動的興趣是從幾個不同的路徑集結而形成的。核心的部份就是對於抗議的高度興趣，這連結到了我學運時期的經驗，以及在投入了相當多的時間和資源之後卻收穫不多的這種挫折感所來。然而，也有些偶然，但對於許多學者的生涯卻又是必然。我想我對於研究領域的投入是偶然的，是一次在我問了發表過很多關於依賴社會的 Alain Touraine 當我在 Paris 的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碩士論文指導老師之後才決定的。他很欣然答應，但說他的興趣轉向了社會運動，然後我就想說，好啊，為什麼不呢？

許多其他的偶然機會也把我帶進了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學者網絡之中，這些學者正在尋找一個可以解釋社會運動的新典範，這些人中包括了 Sidney Tarrow，他給了我第一篇關於社會運動的文章很有用的評語，也變成了我的導師和好友。在 European 大學撰寫博士論文不僅讓我磨練了我的語言，也體驗了其他的文化。我那邊有許多的導師，像是 Philippe Schmitter 和 Alessandro Pizzorno，他們滋養了我的好奇心，然我跨越了學科的邊界，博士畢業之後，義大利的學術的裙帶主義把我推向了國外，那是刺激的經驗，把遷徙的負面經驗轉化成了正面的「根深蒂固的普世主義」。這些幸運的偶然也給了我和其他年輕學者合作的機會，建立了研究的網絡與中心，包括成立了社會運動研究中心 (Cosmos)，現在則位於義大利 Florence 的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當我在思考研究和教學的主題的時候，我都是以社會運動研究為主，原因有很多，包括認知的、情感的、關係的。第一，我發現多數的社會運動研究者人都很好，多半是為了改善世界且出自於真誠的興趣。他們社會的政治信念和經驗總是被主流的學者所批評，但是我卻發現他們在該領域中的成果更加豐富，並且形成了一股很好的研究氛圍。此外，政治環境也決定了理論的創新，在政治場域中，若是被認為邊緣且有問題的非典型的政治不斷出現，且挑戰的抗

>>

議一波接著一波，那麼這種抗議就導致對於「另類政治」越來越高的接受程度，超越了所謂常態的議會政治。

這個對於政治的廣泛定義也解釋了為什麼社會運動研究會有跨領域的豐富理論成果。這個領域侍從連結多個學科取徑中浮現的，從象徵互動論到組織社會學，從社會理論到政治科學，社運研究學者建構了概念和假設的工具箱，藉著結合從不同學科而來的知識而得以可能。這個趨勢也隨著時間更加擴大，從社會學到政治學，延伸到地理學、歷史、人類學、規範理論、法律、經濟學，而每個抗爭政治的新週期也帶進了新的學者到這個領域裡面。

我所珍惜和也希望有所貢獻的就是對於經驗研究的正面態度。社運研究的多元理論和方法論典範是其特點。社運研究者應用了許多不同的方法，把質化和量化方法結合一起，雖然對於某些特定的方法有著批判和自我批判 (從個案研究到量化的事件分析)，但是還未曾有過方法論的戰爭發生過，而方法的多元論也是這個領域的共識。但是在其他社會科學的次領域中會發現有實證主義和詮釋主義的認識論分野，或是本體論假設上的爭論，而社運研究中則傾向更細緻的觀點，即使傾向實證主義的學者也承認了概念建構的重要性，和建構主義者也沒有屏棄互為主體知識的追求。許多社會研究結構了結構和認知 (例如，政治機會和框架理論)，認為他們是結合一起的。相似地，許多研究者結合了對於普世法則的懷疑論和超越案研究之經驗描述的渴望。

這種包容的視野也引起多領域的豐富激盪，並且想要建立一個知識的體系。歸納和演繹的取徑被結合在一起，質化和量化也是。混合方法也被廣泛應用。事實上，社運研究已經對於不同收集資料和分析的方法相當實用主義，雖然有些學者對於社會科學必須中立這點相當堅持，或是有些學者對於社會科學必須中立這點相當堅持，認為研究應該從屬於政治宣言，但是在學術之中的政治化程度則透了規範和倫理的辯論而有所討論。

這其中有許多對於新穎的理論多元論所作的解釋。當然，我們究沒有究計畫像是究計畫也產選舉研究或是社會階層化那樣有固定的資料庫，但是學者也用了許多方法去蒐集資料。不過很少的社運組織會留下檔案甚至是名冊就是。無論如何，把新的資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引進，或是創新，這幫助了經驗研究的茁壯。這也形成了一股規範性力量要去開創不只是針對學術理論而且要導向社會創新的知識。合作的研究計畫也產生了新的方法論反省。

但是即使有這些正向的發展，這樣的的成功可能也是阻礙。特別是當過去幾十年來的研究蓬勃發展集中在全球北方，但是卻不適用南方的經驗。這種邁向社會科學國際化的潮流是正面的，特別是在國際化被理解為不同國家的經驗，學術制度，文化。國際化可以讓我們知道不同的取徑、方法、風格、實做，把經驗放在比較的脈絡下來檢視。但是，對於特別傳統的國際化則可能是有問題的。我有幸可以和來自 35 個不同國家的博士學生漢學者合作，我學到了很多，並且超越了主流昂革魯薩克遜典範。我想我的希望來自於那些年輕的學者，我對於這個高度反身的領域有著很樂觀的期待。

來信寄給 Donatella della Porta <donatella.dellaporta@sns.it>

>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學

訪談Sari Hanafi

Sari Hanafi.

Sari Hanafi是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社會學、人類學、媒體研究的系主任和教授。他是Idafat: the Arab Journal of Sociology (阿拉伯文)的編輯, ISA副會長，以及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位的副會長。他的研究興趣包括了遷徙社會學、科學研究的政治、公民社會、精英形成、轉型正義。他最近的書是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Arab World: The Impossible Promise，這是和R. Arvanitis合著，並以阿拉伯語和英語出版。很少人有像Sari Hanafi對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學以及在西方社會學和阿拉伯社會學之間搭起橋樑貢獻這麼多的。這篇訪談是由摩洛哥的El Jadida大學社會學教授Mohammed El Idrissi所執行的。

MEI: 你在 Damascus 的 Yarmouk 難民營中長大，並且一開始是唸土木工程的。你的社會背景怎麼讓你作出了這項轉變？

SH: 是的，的確！在 1980 年代早期我可是非常熱衷政治的，我那時候想要改變世界！當然，我現在會認為可能都不太了解世界了，怎麼改變。不過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有兩個議題是最重要的：巴勒斯坦的被殖民和敘利亞的威權主義。這兩個議題讓我轉向社會學。我在 Damascus 的難民營時候，在 Day of Land 的那天抗議但被逮捕了。一個特務警察跟我說：「你的團隊會被載去監獄！」阿拉伯的威權主義總是低估了這群「巴士人民」的重要性，不論他們被描述成異議知識分子或是中產階級，他們都是很重要的。我後來迷上的 Foucault 的對於權力和生命政治的分析，到法國去深造。我想要用科學的方式去分析國

>>

家精英，但同時我的行動主義也幫我理解了社會學不只是專業和批判的一門學問，用 Burawoy 的分類而言，還同時包括了政策和公共面向。

MEI: 結合專業和公共社會學這點，挑戰為何？

SH: 在阿拉伯世界這不是簡單的是。社會學就像其他的社會科學，在阿拉伯世界並數一種武術，像是 Pierre Bourdieu 所說的要讓人的常識和意識型態卸去，而是國家現代化計畫的工具。有兩股力量想要去正當化社會科學：威權政治精英和意識形態團體。兩者都強調的社會科學有問題的根源 (從殖民時期誕生的學問) 和外國的資金援助。現在我相信問題不只是來自宗教團體，還包括了阿拉伯的「非自由派」左翼。兩者都輕視阿拉伯世界發生的變化和反對普世民主價值。當然，阿拉伯之春揭露了一些正面的知識發展，但是社會科學的影響還是很有限。我想突尼西亞勢力外，因為那裡的科學扮演了公民社會對話的很重要角色。2015 的諾貝爾獎給了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 是個很重要的象徵勝利。

MEI: 在阿拉伯後起義時代，社會學有對這樣正面認知發展做出什麼樣的貢獻嗎？

SH: 這裡許多後殖民的研究太簡化了，無法理解阿拉伯世界的變化。許多起義你會看到都失敗收場，這不只是因為帝國主義和後殖民的霸權，而是深植的威權主義緣故，以及公共信任的缺乏，因為人民也正在學習多元、民主、自由、正義而已。阿拉伯世界需要社會學的工具去理解社會運動，按照 by Asef Bayat 所描述的，就是沉默、長期但是持續的人民去介入政治，為的是改善社會。

我認為，公共社會學總是要去挑起關於社會行動者改變社會的能力這種討論的可能。作為社會學家，我的角色逝去讓大家知道世界上沒有所謂的絕對的惡或是善。社會學想像和對行動者的關注提醒了我們社會現象的複雜性。換句話說，社會學提醒公眾去思考人民的努力、超越既有地緣政治的解釋 (x 和 y 國家以戰爭來反對)，也超越族群團體之間的紛爭 (這也是許多學者和媒體在所理解的敘利亞或是巴林的衝突)。社會學也提醒我們從共同利益的角度，而非區分類別的角度 (反抗 vs 帝國) 去分析事情。部只有 ISIS 使用叛教的控訴 (takfir) 去形成犧生者祭品 (homo sacer)，而是也包括了那些像平民扔擲炸彈的國家。社會學提醒我們年輕人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閱讀了某些對於可蘭經的詮釋就加入了 ISIS，而是因為他們住在了被排擠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之中。

MEI: 公共社會學在阿拉伯世界扮演了什麼角色？

SH: 阿拉伯世界還有待去承認社會科學在理性化社會辯論和提供現代性問題解決之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阿拉伯地區，你很少會聽到由政府要求社會科學家撰寫的「白皮書」，即使當突尼西亞的獨裁者 Zein Al-Dine Ben Ali 使用科學作為意識形態的武器在 1990 年代對付其伊斯蘭教徒，他並是指社會科學，而是硬科學。科學會議就像其他會議一樣，是被政府監視的。同時，社會學家無法自助，沒辦法建立科學社群然後發揮影響力，保護自己的批判聲音。

MEI: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該地區的科學社群那麼弱？

SH: 這需要兩個過程去強化科學社群。第一，這個專業必須要有地位，但是地位必須透過國家學會去制度化。這兩者在阿拉伯世界都是付諸闕如的。譬如現在只有三個社會學會 (黎巴嫩、突尼西亞、摩洛哥)，而且有趣的是，這些國家中的政府介入是較其他阿拉伯世界要少的。近來，新成立的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已經開始討論其怎麼可以讓專業學會更加茁壯的議題了。

像我之前所說的，科學社群應該組織起來去面對不僅僅是國家的介入，還有像要把社會科學去正當化的那些意圖。宗教團體總是認為會被社會科學所威脅，所以兩者在競爭公共領域的論述代表性。一有次我看了一場電視辯論，是由宗教領袖和社運者的辯論，Sheikh Mohamed Said Ramadan al-Bouti (認為伊斯蘭教反對任何的家庭計劃) 以及宗教政府的政府支持組織「敘利亞女性總聯盟」。當家庭計畫的議題在社會學和人口學裡面很一般的時候，沒有社會學家會把它帶到公共論述之中。另一個例子是 Qatar。其政府保護那些國外大學的分部可以教他們原本大學就在教授的課程，但是誰來保護那些教授呢？最近的一個訪談中，Qatar 的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分校校長說，為了「保護自己」，Qatar 政府是有責任的。所以在這個連言論自由都相當有限的地方，發展「科學領域」為領土的例外空間是一條路，因為地方法律不會認為批評外國社會是不妥的，但是這個風險就在社會學會和在地社會脫節。

MEI: 作為 ISA 的副會長，你怎麼讓社會學社群更加國際化？

SH: ISA 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 2014 年的橫濱世界大會上我被選為國家學會副會長 4 年。我致力於五點：第一，我鼓勵更多的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合作，不論在個人、機構、集體的層次都是。第二，我希望全世界的社會學家，特別是從南美、非洲、中東的社會學家加入 ISA，因為這些地區的會員數仍然不多。第三，我會試圖去爭取資金可以補助來自比較貧窮國家的社會學

>>

者出席 ISA 會議 (類別 B 和 C)。第四，我會鼓勵在那些地區的國家學會成為 ISA 的集體會員。最後，我想讓 ISA 支持更多的國家科學社群活動，透過拜訪他們的活動，鼓勵交流。我覺得我任重道遠。

來信寄給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和
Mohammed El Idrissi <mohamed-20x@hotmail.com>

> 黎巴嫩垃圾危機的生命政治

by Nisrine Chaer, Utrecht University, 荷蘭

Beirut的垃圾山。

在2015年8月，黎巴嫩的一連串抗議是為了回應所謂的垃圾危機，這後來演變成了一場反貪腐的運動。這個垃圾管理危機其實提供了檢視黎巴嫩生命政治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揭露了黎巴嫩國家和宗教政黨所導致的階級和公民身份的暴力。

Beirut的垃圾危機在2015年7月開始，導因於垃圾堆滿了街道的髒亂景象讓人民無法沈受。政府已經結束了和垃圾處理公司Sukleen的一份長期合約，這個關係被視為是黎巴嫩私有化的一個典型案例，在其中政府的合約都被政治精英和親近人士所把持，使得貪腐盛行。所謂的「你好臭」的運動是由公民社會中產階級和社群媒體所發起，為了去接觸更廣大的公眾，包括公民組織，學生，左派，反政教合一者，和女性主義者，並且訴諸更廣泛的議題：貪腐，裙帶主義，公共空間的缺乏，廢除政教合一，警察暴力的課責性。

超過70,000的人民參與了8月29日的重要抗議活動。但是轉捩點發生在一週前，也是「你好臭」運動組織者和抗議者區隔開來的時候。抗議者那開始暴力化，許多被認為是Moundassin—這是幫派和滲透者的阿拉伯語，他們被視為是來臥底破壞的。你好臭運動甚至要球政府要找出「臥底」的和「清乾淨街道」，認為這些暴力青年是Amal政黨派來的。接下來的幾天許多抗議者，主要是左派，挑戰你好臭運動，並用「我是Moundass」的標語去譴責Moundass一字的歧視意味。這讓運動領導因此聲明道歉。

但是這起事件引發了深層的分裂。黎巴嫩媒、政治人物、運動者體對於Moundass的使用再生產了階級和種族主義的論述，歧視抗議者，並強調他們「不同的外貌」。一份黎巴嫩的報紙稱他們為「狗」，其他稱為「露胸的男人」、「蒙面的男人」。有些媒體則是遜尼教派和基督教派的聯盟，認

>>

抗議黎巴嫩政府的「你好臭」遊行者。

為抗議者侍從什葉派的工人階級區，像是 Khanda' El Ghamik 來的，並連結到真主黨。其他則認為抗議者是敘利亞或是巴勒斯坦的難民。

對抗議的回應則是很暴力的。防暴警察用盡手段去控制抗議者的身體，使用暴力去對付從低收入階級來的、非黎巴嫩背景的人。在黎巴嫩的生命政治系統裡面，所謂的 Moundassin 是工人階級和非公民的主體，是被罪犯化和可以犧牲的，這和特權階級的身體是才是值得活著的看法，大相逕庭。

抗議被用有組織的警察暴力所對付。在每一波的逮捕之後，靜坐自願地在監獄前面展開，並且重複著這種不服從。諷刺和幽默得標語批判「滲透」(Indiseis) 一字的使用，有些寫說「我是 Khanda」(Je suis Khanda)，Khanda 指的是 Moundassin 所住的地區。也有寫「我們是 Moundassin」、「# 滲透」、「這是 Indiseis 革命」、「從 Indiseis 來，看我有多軟弱」，而其他則嘲笑其實是警察滲透到群眾之中。

Moundass 的這種再聲明傳散了出來。當 Brirut 的貿易團體領袖宣稱那些抗議者是共產主義者會毀壞經濟和國家的文明時候，抗議者把 Beirut 市區轉變成 Souk Abou Rakhousa，也就是「cheapo 的市場」，在非法的、私有的、不可取得的、熱鬧的市區開啟了市場，吸引了上千民眾前來抗議，開創了新的公共領域。

這場垃圾危機給階級和公民社會帶來了什麼樣的啟示呢？黎巴嫩的政治系統讓政治精英可以從垃圾管理中獲利。這些精英和民眾透過複雜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連結在一起，並透過政教合一加強再生產。黎巴嫩的生命政治包括了新自由主義國家和政教合一行動者的共謀，讓高階級的生命可以被歸屬到高級的類別，而讓底層人民臣屬於上層階級。

多數的掩埋場都在邊緣地帶，事實上，Sukleen 的合約結束時，Na' ameh 的居民封路然後進到掩埋場，因為它引起了嚴重的健康警訊和生態破壞。雖然政府已經承諾要在 2004 年關閉，但是還是持續到了 2015 年。那些住在掩埋場附近的人都暴露在危險的環境之中，顯示了階級和垃圾危機之間的相關性。政府和宗教政黨控制了這些人的生命，讓他們慢性死去。

這種警察的暴力和環境的暴力是一種去人性化的圖像，象徵的黎巴嫩秩序的結構，也持續了好幾十年。垃圾危機不僅讓政府的貪腐現形，也揭露了階級和種族的暴力圖像是如何鑲嵌在政教合一國家和政策之中。■

來信寄給 Nisrine Chaer
<nisrine.chaer@gmail.com>

> 常態化極端暴力

以色列的個案

by Lisa Hajj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美國

2014年7月以色列對加薩轟炸所造成的火勢和煙霧。

在2016年2月15日，George Washington大學的社會學家Amitai Etzioni在以色列的Ha'aretz發表了一篇社論：「以色列應該使用毀滅性武器對付真主黨的飛彈嗎？」[註1]，其文章說，真主黨有十萬枚飛彈，是真正的安全威脅。Etzioni也引用以色列官員的說法說，多數的飛彈佈署在私人的住宅中，若以色列地面軍隊送去毀滅那些飛彈，

>>

「可能會造成許多以色列的死傷，還有黎巴嫩人的也是。」另外一個他討論的選項是使用空爆燃燒彈，去「散播被點燃的燃燒雲，造成大規模爆炸，遍及區域內的所有範圍。」他承認即使警告的話，死傷可能在所難免。因此，他認為，因為「以色列可能被迫去使用空爆燃燒武器，」那些外國對以色列有敵意的專家應該回應這些飛彈的威脅，並希望「在沒有其他選項的情況下，使用這武器雖難被接受，但是可以理解的。」

國家有權力去防禦自己的領土，但是武力的使用是被國際人道法(IHL)所規範的。其前言說了，國家是有責任去區別戰士和平民的。國家或許可以部份使用武力去攻擊戰士，並且要達成合理的軍事目標。可是，即使真主黨的飛彈是佈署在民宅之中，那麼使用像是空爆燃燒彈這種武器也是違反的國際的人道法律的。

而在建議外國軍事專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幫助常態化這種使用空爆燃燒彈造成的極端暴力的時候，Etzioni建議是和以色列對於國際法的態度是一樣的。不像那些屏棄國際法的國家，以色列長期以來就是對國際法有著策略性的詮釋，希望可以把暴力帶進法律條文之中。例如，在2000年，以色列就變成是第一個公開宣稱有權利去允許法律之外的處決為安全政策的選項的國家。前以色列的將軍Daniel Reisner所說的，

我們現在這裡看到的是國際法律的重新修正，也就是說，如果你做某些事情做得夠久的話，那麼國際社會就會接受它。整個國際法就變成是今天所禁止的事情會變成允許的，只要夠多的國家違反了一項法律[註2]。

Etzioni的場景包括了使用空爆燃燒彈，這是以以色列最近的軍事衝突的特別發展為基礎的論證，並且政府使用的理由去證成其策略性的使用無差別的毀滅性暴力。在2000年9月，也是第二次官方稱為「沒有武力衝突的戰爭」開始的時候[註3]，以色列宣稱那是自我防衛，有權力去使用武力對付「軍事實體」，也就是那些在巴勒斯坦半自治區的的約旦河西岸西岸和加薩。在2002年的3月，為了回應哈馬斯的Netanya飯店自殺炸彈攻擊，以色列展開了西岸的軍事行動。「防禦網軍事行動」代表了新的策略：「除草」[註4]，被設計去擴大毀滅的暴力程度，為的是殲滅現有和未來對付以色列的能力。4月9日，在Jenin的戰役中(以色列從1982年侵略黎巴嫩以來的最大規模軍事行動)，13名以色列軍人喪生，這讓以色列內部產生及大的壓力去完成這項軍事行動，沒有進一步的傷亡。以色列沒有把戰士送到建築物裡面，但是先把建築物包圍，使得巴勒斯坦人被迫要當人肉盾牌去保護軍人[註5]，同時，地面部隊的使用也被認為比空襲更有正當性。但是都市戰在策略上比較困難去達成軍事目標，人肉盾牌是一種保護武力的方式，但是2005年的以色列高等法院判定禁止這種方式。

合併起來看，我們看到這些因素促使了策略轉向更大規模的遠距空中暴力。2002年的7月22日，在一個目標為擊斃哈馬斯領導之一的Salah Shehadeh的軍事行動中，一架F-16投擲了一頓的炸彈到加薩的al-Daraj區域，炸彈摧毀了Shehadeh所住的地方的8棟建築物，部份摧毀了另外9棟，除了Shehadeh和他的保鏢之外，另外14名巴勒斯坦平民，包括8名小孩，都被殺死了，多達150人受傷。群眾的憤怒是針對炸彈的規模以及在住宅區轟炸，要求以色列軍方要展開調查，但是調查結論雖然承認「在可得資訊上有所缺失」，可是仍然說該行動是針對恐怖暴力分子的正當目標的攻擊，而那些無辜平民是在Shehadeh所設計的躲藏地點的[註6]。

所謂「無辜百姓」的修辭和「正當目標」正好預示了以色列的「平民敵人」的詮釋架構去解釋人肉盾牌的策略，這是為了把對於平民的死傷責任轉嫁給那些被鎖定目標的組織上面，同樣地，以色列的策略偏好是空襲，也被認為

>>

是「合乎道德」的選項，這在一篇 2005 年的 Tel Aviv 大學教授同時也是以色列軍事顧問的 Asa Kashar 和 Amos Yadlin 將軍文章中可以看到：

若我們把恐怖份子排除在非戰士的類別之外，在戰爭中最小化死傷人數的責任總是排在最後的，我們堅定拒絕這種看法，因為這是不道德的。一個戰士是一位穿著制服的公民。在以色列，一個人常常是一個義務役士兵或是儲備軍人，而事實上，在恐怖攻擊中，那些在恐怖份子附近活動的平民不應該是讓戰士生命受到危險的理由。[註 7]

這樣的修辭策略是為了要讓軍隊的安全作為最優先選項，優先於平民，並且用戰士的「文明化」去包裝。這也完全和國際人道法的精神背道而馳，並且沒有區辨國籍的空間。Grégoire Chamayou 描述這種是「帝國戰士的豁免原則」[註 8]，認為「整個計畫就是為了去讓武裝衝突的法律有詮釋空間，也就是選擇性地使用國際法原理好支持自身國家生存的利益」。[註 9]

在 2005 年，一色列單邊地撤出了加薩的軍隊，封鎖了該區域，在 2006 年巴勒斯坦的選舉，Hamas 贏了，而在 2007 年之後的戰役讓巴勒斯坦政權退出了加薩。這個結果讓以色列宣稱加薩是被恐怖分子所把持且住的是同情恐怖分子的人的這個論述的到了支持。這個論述認為平民被哈馬斯用來當人肉盾牌。[註 10] 這個論述框架可以用來和以色列對於真主黨控制的黎巴嫩地區的說法比較，其把加薩描述成外國、敵意、可攻擊的，這似乎隱含了以色列不應該對平民的死傷負責，即使以色列攻擊造成的死傷也是。就像 Neve Gordon 和 Nicola Perugini 所說的，「事後的詮釋對於 [正當化那些殺了很多人的轟炸] 是重要的，因為其允許了以澀去宣稱暴力是符合國際法的，而且結果會適合呼道德的」。[註 11]

在以色列 2006 年入侵黎巴嫩的戰一中，軍隊謹慎地佈署了不成比例的武力，這是在稱之為「Dahiya 教條」的策略下所執行的在 Beirut 南方郊區住了很多什葉派的行動。2008 年 Gadi Eizenkot 將軍同時也是以色列的北方指揮官說：「2006 年在 Dahiya 所發生的將會在其他任何的村莊中發生，我們會採取不成比例的武力去造成大規模的破壞。從我們的管點來說，那些地方不是平民地區，而是軍事基地。這不是建議。這是個計畫。而且這已經通過了」[註 12]。這些策略的邏輯在 2008 年 10 月被 Gabi Siboni (一位退休的策略分析家) 進一步闡釋：

這個原則是讓不成比例對於敵人弱點的轟炸是主要的戰爭方向，而摧毀敵人的飛彈發射設施是次要的方向。這樣的回應重點是造成大規模的毀壞需要長期和昂貴的重建成本。而轟炸必須快速，比敘以破壞設施回優先。這樣的回應也將會造成長期的技藝，因此增加以色列的嚇阻能力，減少敵對國家對於以色列的敵意。[註 13]

的確，兩個月在這個策略執行之後，以色列發動了「加薩戰爭」。按照聯合國的國際調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軍隊都犯了戰爭罪，以可能違反人道原則。該報告說，以色列鎖定「加薩的整個人口」，無法區辨平民和戰士。以色列攻擊基礎設施的行動是謹慎、系統、策略的。

2014 年的加薩戰爭則是目前最暴力的一次。「雲柱行動」包括了超過 6000 次空襲，發射了 50,000 次的飛彈，這是估計有 21 千噸的炸藥威力。武器包括了無人機，阿帕契的地獄火飛彈，F-16 裝載了 2000 磅的炸藥。[註 14] 目標則包括了基礎建設，像是海水淡化廠，電廠，醫院，學校，大學，高樓層建築，購物中心，以及所有有 Hamas 的建築。這場戰爭造成了超過 2,100 巴勒斯坦人喪生，11,000 人受傷，而多數是平民。有的是整個家庭滅亡，或是整個社區被剷平。[註 15]

對於什麼是戰爭中合法的詮釋是被國家的實踐所形塑的，特別是強權國家。以色列使用極

>>

端暴力和對於平民免於受到戰爭迫害的原則的忽略，是會被其他國家所效法的。的確，Etzioni 提議國外軍事專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應該證成燃燒空爆彈類似武器的使用，這種說法就是在證成極端暴力。這也讓我們社會科學家有了扮演某種角色的機會，知道法律和戰爭的關係，並且遵守國際人道法的詮釋。這個角色包括了要努力發揮我們的專業，繼續讓不成比例的無差別武器成為是不正當的。■

來信寄給 Lisa Hajjar
<lhajjar@soc.ucsb.edu>

註 1：標題其實改變了兩次，見 Ben Norton, "Prominent American Professor Proposes that Israel 'Flatten Beirut' – a 1 million-person city it previously decimated," Salon, February 18, 2016.
註 2：Yotam Feldman and Uri Blau, "Consent and Advise," Haaretz, January 29,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haaretz.com/consent-and-advise-1.269127.
註 3：見 Asher Maoz, "War and Peace: An Israeli Perspective," Constitutional Forum 14 (2) (Winter 2005): 35-76.
註 4：Efraim Inbar and Eitan Shamir, "'Mowing the Grass': Israel's Strategy for Protracted Intractable Conflic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7(1) (2014): 65-90.
註 5：Yael Stein, Human Shields: Use of Palestinian Civilians as Human Shields in Violation of High Court of Justice Order (Jerusalem: B'tselem, 2002).
註 6：IDF Spokesperson, "Findings of the inquiry into the death of Salah Shehadeh," August 2,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mfa.gov.il/mfa/government/communiques/2002/findings+of+the+inquiry+into+the+death+of+salah+sh.htm.
註 7：Kashar and Yadlin, "Assassination and Preventive Killing," SAIS Review, 25(1) (Winter-Spring 2005): 50-51.
註 8：Grégoire Chamayou, A Theory of the Drone, trans. Janet Lloy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5): 130.
註 9：同上 , p.134.
註 10：見 Neve Gordon and Nicola Perugini, "The Politics of Human Shielding: On the Resignification of Spac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ivilians as Shields in Liberal Wars," Society and Space, 34(1) (2016): 168-187.
註 11：同上
註 12："Israel Warns Hizbullah War Would Invite Destruction," Ynet, October 3, 2008, http://www.ynetnews.com/
註 13：Gabi Siboni, "Disproportionate Force: Israel's Concept of Response in Light of the Second Lebanon War," INSS Insight, 74 (October 2, 2008), http://www.inss.org.il/index.aspx?id=4538&articleid=1964.
註 14：Rashid Khalidi, "The Dahiya Doctrine, Proportionality, and War Crim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4(1) (2014-15): 5.
註 15：見 "50 Days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Israel's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0, 2014, http://imeu.org/article/50-days-of-death-destruction-israels-operation-protective-edge.

> 保護民眾

回應Hajjar

by Amitai Etzioni,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美國

Lisa Hajjar 指出了我的社論是要把暴力合法化。為了回應，我會說明我寫那篇社論的動機，然後在有限的篇幅內討論我認為隱藏在表面下的核心議題，以及應該如何處理。

我在 1948-50 的戰爭中目睹了殺戮和死亡，包括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我也失去了許多親朋好友。這個經驗 (我在戰爭中期剛滿 20 歲) 讓我認為所有的戰爭，不論是否正當，都是悲劇，都該盡力避免。我寫了兩本書討論怎麼避免核子戰爭 (《The Hard Way to Peace 和 Winning without War》)。我在 Trafalgar Square 反核，而且甚至快要丟掉我在 Columbia 大學的工作。我後來成為第一個反越戰的行動者 (這個經驗在《My Brother' s Keeper: A Memoir and a Message》)。我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在 Security First 一書中，我以兩個學術研究為基礎，說明伊斯蘭宗教文說道伊斯蘭並不支持暴力。最近，我寫了幾篇文章和社論，警告美國和中國邁向戰爭的危險，並試圖組織中美兩國的知識分子支持雙邊保證相互戒持 (Mutually Assured Restraint)。總之，我人生的多數時間致力於防止暴力的發生。

但很遺憾的是，我還沒有辦法想出一個具體的方法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以有一個兩國並存的解決辦法，但我強力支持這條出路。我和巴勒斯坦的學者 Shibley Telhami 一起建議，若是我們停止把焦點放在過去的歷史，不要只是想要究責，而去討論我們怎麼可以邁向未來，那麼這種方式是可行的。(一旦我們有兩個國家，那麼就會有足夠時間成立真相委員會去研究過去，[註 1]) 而且我指出那片土地是足夠給兩個民族的，而不是像其他人說的要把對方到地中海或是約旦去。[註 2]

現在回到我的社論。Hajjar 相信我的文章是要把暴力合法化。但我的目的非但不是這樣，還是要去避免流血傷亡。我想不不爭的事實是真主黨有約 100,000 枚飛彈，而且是用來攻擊以色列的。他們也從來沒有隱藏他們的目的。真主黨在 2006 年發射飛彈攻擊以色列的時候並沒有遲疑，但是以色列在從黎巴嫩撤軍之後遵守了所有的國際法 (當然以色列並沒有權利在一開始攻擊黎巴嫩)。這是聯合國也承認的，而且聯合國很難說是支持以色列的。此外，我相信有證據說多數的真主黨飛彈是佈署在民宅之中的，的確我們應該問應該怎麼處理這種情況。

我因此在我的社論文章中說，在那些飛彈還沒有發射之前，我們應該問一個倫理和法律的實際問題：以色列應該怎麼回應這樣的攻擊？這個發問的目的不是要去正當化暴力，而是要防止暴力。若是以色列的軍隊要挨家挨戶去毀滅這些飛彈，那麼兩方都會有相當嚴重的死傷，所以應該要避免。過去我說過，美國曾經攻擊 Tokyo 和 Dresden 的平民，以色列據稱也在 2006 年的 Beirut 做過同樣的事情。我則是反對這種說法。[註 3] 我後來說是，兩個美國軍事專家建議高威力的傳統爆炸武器可以被使用，前提是平民有給予足夠的時間去撤離該地區。我承認不論什麼方式，都會造成雙邊的傷害，而這種傷害也是所有的戰爭中都會發生的。這種雙邊的傷害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避免戰爭的最主要原因。我文章結尾建議局外人應該去想想若是身處於戰爭中，他們可不可能有更好的方式去嚇阻真主黨的飛彈威脅，並且想想若飛彈一旦發射，要怎麼回應？

我不是要去評價那些 Hajjar 所引述的那些官員說法，也不是要評價那些說法可能造成的影響。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那不只是一個以色

>>

「目的不是在合法化暴力，而是防止它。」

列議題而已。把這些難題看成是單一國家的議題會導致錯誤的結論。這是個美國和其中東的盟友都要面對的，而且中東的恐怖分子持續地在違反國際人道法，也就是他們並沒有區別戰士和平民。他們把彈藥藏在清真寺之中，讓救護車運送自殺戰彈背心，從民宅中狙擊，在學校佈署武器，然後利用平民當人肉盾牌。

那些搜尋恐怖份子的人基本上有兩個作法，不是讓死亡人數繼續增加且被 ISIS 佔領改地且屠殺人民，就是不分戰士和平民去攻擊且造成許多人死亡。這兩者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我的社論文章目的是要讓讀者去想想這種道德難題該怎麼處理，這點也是 Hajjar 的文章完全沒有提及的。

來信寄給 Amitai Etzioni <amitai.etzioni@gmail.com>

註 1： Etzioni, A. and Telhami, S. “Mideast: Focus on the Possibl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7, 2002

註 2： Etzioni, A. “Israel and Palestine: There’s Still Room at the In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9,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israel-palestine-theres-still-room-the-inn-10212.

註 3： Etzioni, A. “Should Israel Consider Using Devastating Weapons Against Hezbollah Missiles?” Haaretz, February 15, 2016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premium-1.703486.

> 在不人性的世界中保有人性

懷念Vladimir Yadov

by Dmitri N. Shalin,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美國

2009年80歲生日的Yadov。

在1960年代，Leningrad的「具體社會研究室」是社會學研究的重鎮。其防止了科學研究免於被歷史唯物論所攻陷。這些社會學家跟政府說，社會學的工具可以讓共產主義更加進步，並且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預測可以被精確地觀察到。Vladimir Yadov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帶領了俄羅斯社會學的復甦。要曉得，在那之前的社會學可是被Bolshevik革命和Stalin的鬥爭所毀滅了。Yadov的先驅研究Man and His Work是和同事一起撰寫，其《Methodology and Methods of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則推動了整個學科的前進。

1968年的時候，我是Leningrad State大學的三年級學生，而我的導師Igor Kon把我帶到Yadov的實驗室。接下來的8年，我參與了研討課程，從大學生變成了博士生，然後成為研究助理。那是在大城市中的一個研究核心，由Yuri Levada, Igor Kon, Georgy Shchedrovitsky所帶領，他們的自由派觀點，對於國際文獻的熟稔，以及敞開辦公室大門的政策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並且讓許多年輕社會科學家非常印象深刻。

Yadov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不刻意的去做某些事情，以及他對於權位追求的毫無興趣。他願意跨出官方教條的侷限，這點很特別。他跟大學生和學者講話的態度並沒有不同，我還記得有一次他跟我解釋個性理論的一些細微部份的時候，他的辦公室同事就在一旁等著他。真正重要的是他對於社會學解釋的貢獻，因為那時候的社會學研究有著很深的價值取向，並且是替社會主義政權服務的。這些價值其實和社會學理論的發現很多時候並不一致，例如，工人對於黨要求的無私奉獻並沒有什麼熱誠，但是對於工作而得的物質回饋卻是在意的。六零年代的時候，經驗社會學開始挑戰了共產主義的信念，可是在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想要去鎮壓布拉格之春的時候，蘇聯社會學和其自由派就非常艱困。Yadov因此努力要拯救自己的團隊，也就是部份的蘇聯科學院，但是最後他自己卻被趕出去了。Yadov總是有尊嚴地拒絕去批評自己的同事，也拒絕在這種不人性的環境下泯滅人性。[註1]

在1975年，我從俄國移民到美國。我和Yadov的聯繫要一直到1987年才恢復，那時候Mikhail Gorbachev開始了政治改革。那些年對於俄國社會科學家來說是一直想要填補的一段失去但是令人興奮的歷史。[註2] 很快地Gorbachev要求開放政策(glasnost)和經濟改革(perestroika)，之前被鬥爭的學者也被找回去帶

>>

領新成立的機構，像是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s of Sociology)，民意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Opinion)。Yadov 那時已經搬到了 Moscow，很快成為了知識圈的領導[註3]。他被選為俄羅斯社會學會會長和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他致力於研究勞動，後來也是 ISA 的副會長。

專業倫理守則在 1988 年由一群有心改革的學者成立，確保學術研究自由，因為這對社會科學來說非常重要。這些倫理規範鼓勵社會學家去「容忍和尊重」反對者，展現「conviction 的勇氣」， 避免「意識形態標籤」，避免「訴諸權威」，然後反省過去，解放那些在追求靈魂的時代的俄國知識分子[註4]。

在經濟改革的時候，有些人宣稱自己是隱性的異議人士，許多人竭力想去批判蘇維埃的過去，而多數人明顯地丟棄了自己的黨證。但 Vladimir Yadov 不是這樣的人。當他在自由派知識分子被迫害的時期感到萬分痛苦的時候，他並沒有加入政府。他把他的黨證保留下來，並且始終相信 Palmiro Togliatti 擁護的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因為他認為那是最符合人性的政治經濟系統。他也鼓勵其同事去把社會問題看成自己的研究問題，顯示了知識如何可以和社會改革連結在一起。「我社會學家們不應該只是滿足於寫書而已，我們還要盡力去改善社會。」Yadov 寫道，「對抗貪腐、建立中立的法院，成立進步的稅收制度，以及還有很多事情，這些都是人民所要求的！」

歷史的轉軸在 Putin 掌權之後再次加速起來。他一開始並沒有揭露自己的政治計畫，但是在第一任總統之後，其越來越清楚顯示了對於公民社會的蔑視。後蘇維埃的社會學者發現到批評政府已經不再安全了，而那些參與公共抗爭和堅持公民權利的學者面臨到了很大的阻礙。

在 2010 年，極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成立了一個敵對的社會學會，挑戰 Yadov 和其同事的組織[註5]。在 Yadov 挺身對抗俄國民族主義學者和敵對學會的 Gennady Osipov 後，他卻必須替自己辯護，因為他指控對方是法西斯主義者。面對反動的政策、自身的衰老和疾病，Yadov 覺得自己越來越邊緣化。

2009 年，在 Yadov 的 80 歲生日的場和尚，其學生和朋友發表了他的榮譽論文集，表彰 Yadov 對於俄國社會學的貢獻。Volodia 是其朋友對於 Yadov 的稱呼。他一直對於國家的遠景感到樂觀。他持續辯論各種議題，並且熱衷研究。但是其心情卻是沈重的，因為俄國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充滿了人權迫害和民族主義教條的事件。

我和 Yadov 的聯繫在 2006 年開始頻繁起來，那時我和我的同事 Boris Doktorov 開始了一個「國際傳記計畫」，這是一個網路上紀錄二戰後社會學復甦的計畫。我們蒐集俄國社會學家的訪談，網路論壇，並且推動社會研究的傳記方法[註6]。Yadov 對於這個計畫很趕興趣。他撰寫回憶錄，接受訪談，提供很少見的資料，特別是關於早期的蘇聯社會學以及在赫魯雪夫解凍結束之後的演變和經濟改革時的轉型。

Yadov 於 2015 年 7 月 2 日過世。在那之前的幾年，我和他針對俄國社會學的命運開啟了一連串的網路對話。我們彼此同意去挑戰彼此，我們討論學者在面臨蘇聯政權時做出的妥協，知識分子選擇出走時的道德難題，留下的道德代價，蘇聯社會學在 Gorbachev 革命後的轉型，Putin 政權下言論自由的迫害，政治改革的悲觀前景，以及公共社會學的未來，特別是在一個會因為說實話和做批判研究而受到迫害甚至喪生的國家裡面，這些議題是如何有其特殊之處。

Volodia 很直率的回憶他的親人在 1937 年遭到整肅、對於自己的猶太血統的不安、以及怎麼在一個反猶主義的國家裡面隱藏自己的族群認同。他告解道，過去的妥協其實讓他今天很不好受，他「在他無法去 Moscow 替 Yuri Levada 辯護的時候，他非常膽小怯懦。」他「在許多同事在黨會議裡面遭到鬥爭的時候，他選擇了沉默。」

「正直外向的人」，「很難保護機密資訊的人」。他是這些特質「有助於友善的溝通」和「幫助他成立研究團隊，這個團隊的表面象徵不是那麼重要，但是集體的貢獻卻是最重要的事情。」

「真的，耶穌是第一位社會主義者！」當 Yadov 被挑戰其政治信仰的時候，他會這麼說。「我一直是社會主義者。」他很驕傲的這麼告訴我，「我深信社會正義的實現在於民選的代議士努力想要減少貧富差距。」

Yadov 對於那些選擇出走的人有這樣的解釋：「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們，但同時我也覺得他們有著不同的理由。」很有趣的是，他解釋在經濟改革的輝煌時期，也就是他是社會學研究所的所長的時候，他挑選年輕的學者出國深造的同事，也焦慮地看著「誰會回來而誰不會，因為英國委員會是規定所有人都要回來的。」

Yadov 會對那些擁抱極端政治信念和想要恢復蘇聯帝國的同事感到憤怒。「在蘇維埃時代，Osipov, Dobrenkov, Zhukov 屬於黨的幹部，而且至今都還保留這個地位。他們獨尊「沙皇的價值」，我所知道的 Osipov 是一個沒有原則的人，會說謊，會設計他人。」Yadov 對於其他學者和管理者有著很誠實的觀察。我相信他這邊所說的故事日後會讓其他的俄國社會學家很驚訝，他對於當前政治的評斷也是。

Yadov 已經從遠離當前的政治事務了，這點

>>

可以從他在 2011 年 6 月 25 日寫給我的信中可以看見：「對於 Putin，我除了厭惡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感想。他是一個嚴峻且犬儒的人，在乎權力卻輕視自己的人民，並且追求財富和奢華。當他被問到對於自由政治看法的時候，他居然說，那些自由派只是想要掌權和錢而已！但是這個人的財富卻可以透過壟斷石油管線而不斷增加。毫無疑問的，這人可以鬥爭任何人，包括了 Dmitri Medvedev（總統）？你可以想像未來 30 年他會怎麼地被歷史負面的評價。」

我和 Yadov 的對話適時地在俄國開始了，並且反映出了他在晚年最關心的、以就是其一生為何而戰的議題[註 7]。

不論是否選擇站在歷史的潮流上，你會發現你始終會被捲進違反你意願的戰場之中。或是你是自願加入戰場的話，那你必須面對道德的難題和代價[註 8]。在 Yadov 的晚年，他告訴我的助理 Boris Doktorov 說，認為自己是「非常幸運的人」且「有個非比尋常地快樂的人生」。我想，主要原因是他奮戰過，也迴避過一些紛爭。Yadov 象徵了一個非常有情緒智商的人，因為他試圖保持理性與清醒。他有妥協，有犯錯，夢想有實踐、也有幻滅的時刻，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希望。

今天，我們紀念 Vladimir Yadov，一位謙卑但勇敢的學者。我們慶祝這位公共知識分子的一生對於歷史、社會制度、集體記憶的貢獻。世界因為有了像 Vladimir Yadov 這樣的人而變得更美好。■

來信寄給 Dmitri Shalin <shalin@unlv.nevada.edu>

註 1： 見 Shalin, D. (1978)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Sociology, 1956-1976.”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 171-91; (1979) “Between the Ethos of Science and the Ethos of Ideology.” Sociological Focus 12(4): 175-93; (1980) “Marxist Paradigm and Academic Freedom.” Social Research 47: 361-82; Firsov, B. (2012) History of Soviet Sociology, 1950s-1980s (in Russian). St. Petersburg: European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

註 2：Shalin, D. (1990) “Sociology for the Glasnost Era: Institutional and Substantive Change in Recent Soviet Sociology.” Social Forces 68(4): 1-21. Doktorov, B. (2014) Contemporary Russian Sociology.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Investigations (in Russian). Moscow.

註 3：(2009) Vivat Yadov!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 (in Russian). Mosc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RAN.

註 4：Firsov, B. (2010) Dissent in USSR and Russia, 1945-2008 (in Russian). St. Petersburg: European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 (2010); Alekseev, A. (2003) Dramatic Sociology and Sociology of Auto-reflexivity. Vols. 1-4 (in Russian), St. Petersburg: Norma. See also Shalin, D. (1989) “Settling Old Accoun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December 29; and (1990) “Ethics of Surviv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4; (1987) “Reforms in the USSR: Muckraking, Soviet Style.” Chicago Tribune, February 16.

註 5：Yadov, V. (2011) “A Sordid Story” (in Russian). Trotsky Bulletin, December 6; Shalin, D. (2011) “Becoming a Public Intellectual: Advocacy, National Sociology, and Paradigm Pluralism,” pp. 331-371 in D. Shalin,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Progressive Politic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註 6：International Biography Initiative. UNLV Center for Democratic Culture, http://cdclv.unlv.edu//programs/bios.html.

註 7：(2015) “From Dialogues of Vladimir Yadov and Dmitri Shalin” (in Russian). Public Opinion Herald, No. 3-4, pp. 194-219, http://cdclv.unlv.edu//archives/articles/vy_ds_dialogues.pdf.

註 8：Shalin, D. (1993) “Emotional Barriers to Democracy Are Daunting,”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7; (2007) “Vladimir Putin: Instead of Communism, He Embraces KGB Capitalism.” Las Vegas Review Journal, October 24.

> 凝視在地、面向世界

by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大學(Linz), 奧地利, ISA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 貧窮、社會福利、政策研究委員會(RC19), 工作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30), 女性和社會研究位元會(RC32), ISAVienna 2016社會學論壇在地籌備委員會副會長; Rudolf Richter, University of Vienna, 奧地利, ISA家庭研究委員會(RC06), 在地籌備委員會會長; Ida Seljeskog, University of Vienna, 在地籌備委員會

Vienna大學一隅。Vienna大學攝影。

在地委員會歡迎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家到奧地利Vienna參加第三次社會學論壇

下一個月，我們在地籌備委員會將歡迎ISA的全球學者來參加在Vienna舉辦的第三屆ISA社會學論壇。也請蒞臨我們的網站。我們會強調在地和全球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

> 走向在地：對於奧地利日常生活和社會學歷史所受到的啟發

我們很榮幸有機會在Vienna大學舉行這次ISA論壇。Vienna大學在社會科學和哲學有著很強的傳統，而籌備委員會已經籌備了超過2年了，並且受到許多奧地利其他大學

>>

Vienna大學外觀。Vienna大學攝影。

的幫忙，以及來自 Innsbruck, Graz, Linz, Salzburg, Vienna 和匈牙利的學者的協助。

我們想要歡迎妳來和我們一起「在地化」，見面、討論、並且受到 Vienna 的國際文化薰陶和感染。此外，我們也鼓勵大家彼此認識，並且會有遊覽參觀活動。

加入我們一起參觀傳統的 Vienna 紅酒吧，並且步行參觀城市。我們的社會學旅程包括了有導覽的 Marienthal 博物館參訪，其位於 Gramatneusiedl 的村莊，也就是著名的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或是「Marienthal：失業村莊的社會誌」。Marie Jahoda, Paul Lazarsfeld 和 Hans Zeisel 告訴了我們失業怎麼摧毀了人的社會生活。他們的發現和混合方法啟發了許多研究，至今還是很有影響力[註1]。

Vienna 的社會學傳統和奧地地只可以從更大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下來理解。一方面，我們有「紅色 Vienna」，也就是上個世紀的初期。但是另一方面，包括了上百位的奧地利社會學家也都逃離的納粹佔領的奧地利。許多討論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和對於奧地利社會學影響的文章可以在 ISA 論壇部落格上找到。

> 走向國際：追求很美好的社會

最為主辦 ISA 論壇的社會學家決定使用「全球社會和追求更好的社會」讓我們去反思在地和全球之間的關係。

Vienna 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位在歐中的中新。鄰近國家的強大影響力可以在該城市的文化、料理、語言種找到證明。該城市有許多的國際機，包括了歐盟的議院和 Vienna 的 UNO 城市，其支持論壇作為國際論述的場域。然而，ISA 的上一次於橫濱的世界大會 (面對不平等的世界) 還是很重要，因為我們邀請了來到世界各地的學者，所以必須承認奧地利和歐洲所面對的挑戰，因為歐洲有維護平等、政治、民主、人權社會的責任。敘利亞的戰爭和殖民與後殖民的歷史迫使人們逃離和遷徙。

許多歐洲人已經試圖爭取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了，其透過的方式包括了抗議和支持反對暴力和不平等的提案。但是另一條路把奧地利和歐洲看成一個封閉的社會，推動的是排外的政治，想要關閉邊界和讓不平等持續。而論壇將在 Vienna 舉辦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契機，因為現在的像是難民、被迫遷徙、族群融合的政治的議題都是歐洲正在處理的挑戰，而且右翼運動蓬勃展開，他們想要把建立一個不包括「非歐洲人」的歐洲。這讓人想起發生才不是很久的、很可怕的歐洲史。

>>

奧地利的是會學政在面臨所有的這些議題，而奧地利的社會學家也都和全球有著緊密的結合。這些挑戰和連結反映在了場次的安排上面，來自世界各地的演講者將會討論「面對歐洲及其之外的多重危機」，「社會學思想和追求更好的社會」。

最後，ISA 和在地的籌備委員會已經邀請的地方和國際的出版社，並且會有一個專門的地方展示其出版品，也會有作者面對讀者的活動。展示大廳也會展示奧地利的社會學、研究機構，獎學金等等。

> 一起來 ISA 論壇

在過去十年來，ISA 的討論已經著重在對於全球和在地的交互關係必須要更加敏銳才行。的確，許多的當代地方的鬥爭其實士被全球的潮流所導致的，像是勞動和自然的市場化，工作和政治的跨國化，集權或是民主國家的重要轉型等。當我們在 7 月在 Vienna 見面的時候，我們都會討論這些議題的，而且就像世界上社會學家一樣，我們也會在地方和全球的脈絡下討論。論壇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一起這樣的全球對話。最後，我誠摯歡迎各位到奧地利的 Vienna 來參加 ISA 第三屆社會學論壇。

來信寄給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和 Rudolf Richter <rudolf.richter@univie.ac.at>

註 1： 見 Richter, R. “The Austrian Legacy of Public Sociology.” Global Dialogue 5(4), Dec. 2015,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the-austrian-legacy-of-public-sociology/

> 奧地利的不平等、貧窮、繁榮

by Cornelia Dlabaja, University of Vienna, 奧地利, Julia Hofmann,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奧地利, Alban Knecht, Johannes Kepler大學(Linz)

奧地利長期被認為是高生活水準的國家。其 GDP 是 51,300 美元，排名第 14 位 (2014，世界銀行)。而長期的公共住宅傳統讓 Vienna 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社會穩定狀態。但是這不表示奧地利每個人都很富裕。

仔細看特別的社會群體後，我們會發現一個相當分隔和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有 12% 的人口暴露在貧窮的風險中，移工的風險則是 33%。雖然經濟不平等在 OECCD 國家中不是很明顯，在 1990 和 2011 之間，後 20% 的貧窮人口的收入減少了 47%，而前面 1% 的收入增加了 16%。整體說來，奧地利的不平等是很明顯的，吉尼係數是 0.75。

而怎麼解釋這個富裕國家的這種不平等呢？奧地利教育系統導致了代間社會地位的傳承。大學畢業生的後代有 2.5 倍更高的機會可以上大學。而就像其他國家一樣，教育也決定了收入。每個多一年的教育增加了收入大約 5.4%。移工特別是教育體系中的弱勢 (部份因為國外教育可能不被承認)。

性別不平等也是問題。年輕女性現在比起男性有比較高的教育程度了，但是女性仍然比男性賺了少了 23.4%，奧地利女性也擁有得比男性少，女性的單身家庭的財產少了男性單身家庭約 40%。這個性別不平等是連結到整個福利體系的，因為該體系「保守」，支持了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而缺少兒童照顧中心以及傳統家庭規範的持續，這讓女性一直很辛苦。

奧地利的勞動市場政策越來越像彈性化邁進，讓不平等繼續持續。移工和女性更有可能從事低新的危險工作。

「那些在奧地利發生的不好的事情，世界其他地方也難以倖免。」

失業率雖然低，但是逐漸在攀升，這特別影響了低技術的工人和移工。

若更仔細的看奧地利的社會結構，雖然說看似穩定，但是卻逐漸的沿著性別和族群的軸線極化、分裂，緩慢邁向社會不平等。現在很流行說任何壞的事情都來到奧地利了，但是幾年之後就會擴散到全世界。■

來信寄給 Cornelia Dlabaja <cornelia.dlabaja@univie.ac.at>, Julia Hofmann, <julia.hofmann@jku.at>, Alban Knecht <alban.knecht@jku.at>

> 社會不平等、難民、「歐洲夢」

by Ruth Abramowski, Benjamin Gröschl, Alan Schink, and Désirée Wilke, Paris Lodron University of Salzburg, 奧地利

在難民營和人道修辭表面下的社會真實。Arbu繪。

難民潮大量湧入歐洲，有時候被德國媒體稱為「新大遷徙」(Völkerwanderung)。德國接受了最多的難民申請，但是若是相對於國家人口總量，德國只是排在歐洲的第5名，匈牙利是接受最多移民比例的國家，瑞典第二，奧地利第三，芬蘭第四。

澳地利認為自己在這個潮流中被困住了。德國和奧地利的邊界地區，特別是在 Salzburg 和 Freilassing，已經變成了難民到達中歐的集

>>

中地，奧地利的社會也有許多的緊張和不安。一方面，儘管友人對於歐洲的難民危機的抱怨和邊界管制呼籲，許多人還是懷抱著歐洲夢。另一方面，恐懼和抱怨導因於偏見，因為人們認為難民是自願被吸引來歐洲的，而非被迫的。

按照 UNHCR 的說法，在 2015 年有 6 千萬的人遠離家園。多數難民是因為戰爭被迫離開，或是基於貧窮或是飢荒等因素，特別是後殖民之後的政治惡化。但是只有不到 3% 的這些人到了歐洲，其他都是到鄰近的地區。

2015 年，只有 50,000 人在奧地利申請庇護 (UNHCR-Austria, 2015 年 9 月)。這個數字是每 100,000 人有 332 人申請。其中的 11,000 背成認為難民，得到了基本的物質補給 (82 歐元 / 月)。雖然其他人還在等待結果，通常需要 3 到 6 個月，他們得住在帳篷中，每天可提供三餐，但是確有可能一天都吃不到熱的食物。然後還有一張床。此外，他們有 1.3 歐元的每日零用金，之後則是租金補貼 120 歐元 / 月 (家庭是 240 歐 / 月)，200 歐元是零用金 (小孩 90 歐元)。重要的是，他們不被允許在等待的時間工作 (Art. 15a B-VG, BKA-Austria)。

我們訪談了約 30 位難民，地點多在難民營或是庇護中心，許多人都有其未來的夢想：希望可以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有工作，為家庭奮鬥，或許還可以買房子。簡單說，就是希望不要活在恐懼之中。

在這情況下，也就是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普遍存在富裕的歐洲國家，難民可以被視為是老化社會的希望：年輕和高生育率，高技術的人 (聯合國世界人口前景：2015 報告)。長期看來，難民可以幫助保留我們國家的福利和社會體系，短期則可以刺激經濟，特別示弱他們有機會工作、賺錢、繳稅。

從實用角度的觀點來說，我們因此應該問：為什麼我們會要辯論是否難民要被遣返，而不是討論如何讓他們融入社會？

來信寄給 Ruth Abramowski <ruth.abramowski@sbg.ac.at>, Benjamin Gröschl <benjamin.groeschl@sbg.ac.at>, Alan Schink <alan.schink@sbg.ac.at>, Désirée Wilke <desiree.wilke@sbg.ac.at>

> 性別平等和奧地利的大學

by Kristina Binner, Johannes Kepler大學(Linz), 奧地利， ISA 貧窮、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委員會 (RC19)，女性與社會委員會(RC32)，Susanne Kink, Karl-Franzens大學(Graz), 奧地利

女性與男性長期以來在奧地利的大學裡面就有不太均等，雖然學生的男女比例看起來有點平均 (男 57%，女 43%)，但是學者就不是這樣的比例了。教授之中，僅僅 22% 是女性。而最近大學的改革會讓性別更加平等嗎？

> 奧地利的創業和管理大學

自從 2002 年的大學法案實施以來，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被引進去重組大學和政府之間的關係。現在，大學被要求像是企業一樣，要創業也要管理。雖然政府從前者的角色退下，但是大學要去彼此競爭財務或是象徵資源。副校長已經被賦予更高的決策權力，而像是專家委員會或是學校諮詢委員會也很重要。這些改變主要是去讓大學能有更好的領導角色、正專業的能力，但這些改革有辦法增進性別平等和家庭友善嗎？

> 性別平等？

「最近的改變可能帶來更多的平等。」

作為在 2002 年大學法案所定義下的「自主的組織」，奧地利的大學有責任去引進性別主流政策，包括了建立協調中心，確保機會平等，建立工作小組推動機會平等，設定 40% 的婦女保障名額。

我們還不清楚性別平等政策是否會被大學的新預算模式所支持，因為雖然每個大學有責任去實現新的性別平等要求，但是個大學的財務資源是不一樣的。總體來說，大學的重新組和新的性別主流措施似乎是可以增進性別平等的，特別是在科學領域。

> 家庭友善？

家庭的需求已經被認為是對於女性學者來說是個障礙，所以奧利地的大學已經使用一種管理策略，像是「大學和家庭」的監督，這是被政府所支持的。透過提供好的兒童照顧，大學用這種方式來吸引人才。同時，保守的親職文化也體現在大學對於兒童照顧的重視，把女性視為母親，再生產了異性戀家庭的圖像。

奧地利的大學的最近的改變反映了經濟化、性別平等、家庭友善政策之間的複雜關係。然而重要的是，雖然這些方法可能會在組織的層次上產生影響，科學文化和規範則有著性別化的預設。例如，人們預設學者總是以工作優先。而學者必須總是可以聯絡得到和有彈性，這點反映了男性的工作時間分配。女性多數是照顧者，所以是很難達成這些期待的。■

來信寄給 Kristina Binner <Kristina.Binner@jku.at> 和 Susanne Kink <susanne.kink@uni-graz.at>

>工作時間和追求更好的生活

by Carina Altreiter, Franz Astleithner and Theresa Fibich, University of Vienna, **奧地利**

對於工作時間的鬥爭向來是在歷史上和工人反剝削的鬥爭相連一起的。一天八小時的工時是工運的訴求，而直到1980年代許多的西方工業國家逐漸都減少了工作天數了。

而從那時候開始，除了法國之外，雖然看到了生產量的提昇，但是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進步。可是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已經把關於不平等分配的議題放到的辯論的議程之中了。透過Eurostat的資料，我們討論現在在歐盟的工作時間發展狀況，以及和挑戰不平等如何相關。

>工作時間和不平等

一方面，有些歐盟的人工作時數很長，32%的人一年內又超過一個月的時候是一天工作超過10小時的。其他的問題像是兼差工作(2014年是20%)或是失業(2015年8月是9.5%)。工作強度的提昇，不論是物理或是生理上的疾病都是因為高工時所引起的。而工人沮喪和勞動力貶值也是另一個面向。這些只是工作時間極化的部份後果，這也威脅了整個社會。

另一方面，兩性之間也繼續有著不平等的工作時間分配現象發生。第一，正職工作和長時間工作是「男人」的事情，然而越來越多的女性只有兼差工作。即使歐盟的多數28個國家中男性的兼差比率增加到2014年的8.8%，女性的兼差比率還是有三倍之高(32.5%)。第二，女性比男性的家務工作時數一天要多上2個小時。這些都讓女人更加弱勢，生涯沒有發展性，福利不多，更有可能在老年時候步入貧窮。

>減少工作時間會減少社會不平等嗎？

改變工作的標準時數將會滿足許多勞工的需要。研究顯示超過30%的工人寧願工作少一點，然而許多兼差工人(2014年有一千萬)則偏好工作久一點。但是減少標準工時會減少正職和兼差之間的不平等，也會增進性別的平等。此外，減少失業人數，縮短每週工作天數會增加工人的議價權力，或許會對不平等有所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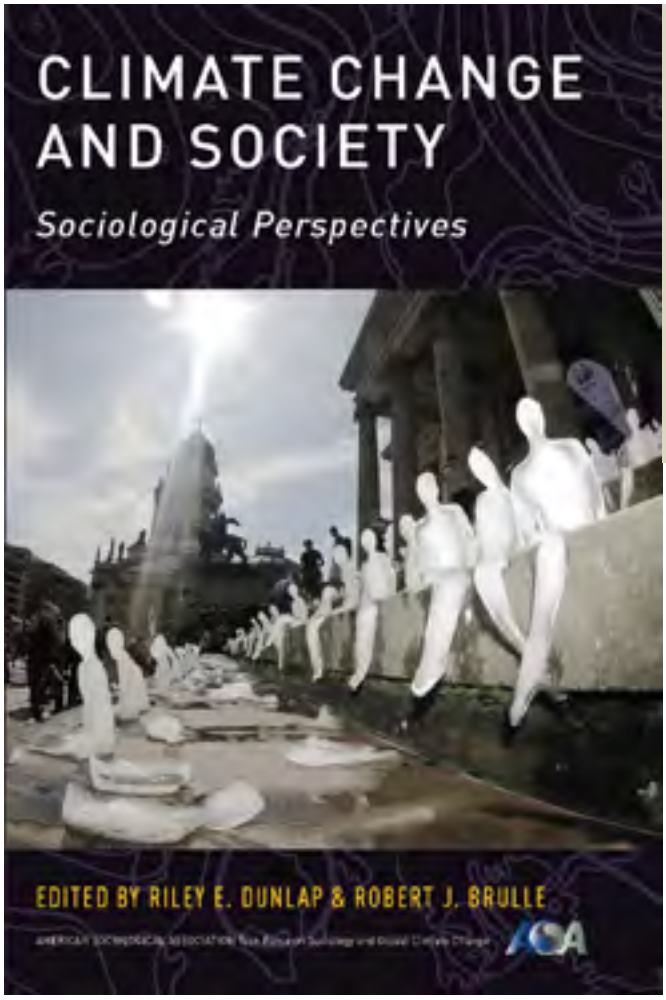
然而，減少有給工作時間並不會自動地產生正面的重分配影響。若是工作時間的減少是解放計畫的一部分的話，那政策就要必須考慮像是工作強度增加和工業關係的去管制化等的挑戰，以及要有配套措施去確保無給勞動的重分配。■

「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時數還是不平等。」

來信寄給Carina Altreiter <carina.altreiter@univie.ac.at>，Franz Astleithner <franz.astleithner@univie.ac.at>，Theresa Fibich <theresa.fibich@univie.ac.at>

> 社會學和氣候變遷

Riley E. Dunlap,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美國, ISA環境和社會委員會委員(RC24) ，Robert J. Brulle, Drexel University, 美國



Riley Dunlap和Robert Brulle是傑出的環境社會學家。他們分別是美國社會學會的社會學和全球氣候變遷專案研究小組的主席和副主席。其報告最近集結成書，《Dunlap and Brulle 》(編輯),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其開創行的研究顯示了國家的社會學會如可以透過鼓勵研究合作來討論社會和政治的議題。

人類索引起的氣候變遷是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的問題，並且代表了一種存在的、長遠的威脅。自然科學家已經紀錄分析的暖化，就像一個世紀前的「溫室效應」的發現一樣。1990 年代之前，科學已經成為了相當制度化的領域，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指出地球正在暖化，並且對地球的自然和社會有著負面的影響。這可見跨政府氣候變遷論壇 (IPCC) 的報告。

面對這樣全球暖化的證據，特別是減少碳排放量，自然科學家已經辨認出了氣候變遷其實是「人的問題」，也就是說，是被人類行為所導致的，然後反過來影響人類自己。所以要改變的話，是要透過集體行動才得以可能的。IPCC，聯合國研究委員會，以及其他主要的研究組織，像是國際社會科學委員會、國際人類多元研究委員會的全球環境變遷計畫 (後來的未來地球計畫) 等等，都已經呼籲要社會科學也加入氣候變遷的研究之中了。

類似地，這些呼籲建議社會科學家可以幫助「教育公眾」氣候暖化的知識，並天真期待公共的理解可以造成政策的改變。在缺乏社會學觀點的情況下，這些努力把個體看成是主要的行動者，是這些個體製造探排放，但卻忽略了社會學其實是把個人行動放到社會結構的脈絡下來理解的，所以整個忽視碳排放是和社會、經濟、政治等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

更廣泛的來說，既有要整合社會科學到氣候變遷研究的努力主要是採取「後政治」的立場，要去把氣候變遷去政治化。例如，IPCC 把氣候變遷主要看成是一種自然物理現象，是可以被科學證據、技術突破、管理技巧等解決的，並不考慮社會經濟秩序的基本重組。

在這個脈絡下，美國社會學會 (ASA) 成立了一個「社會學和全球氣候變遷」的專案小組，負責讓大家知道社會學分析氣候變遷的價值。而專案小組的領導成員認為我們應該要做更多，而不是只是寫報告給 ASA 而已，因為我們的聽眾不只是 ASA 成員，還包括整個公眾。所以，我們的書：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由 Oxford 在去年 8 月出版，作為 ASA 的官方出版品。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總結了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對於氣候變遷的分析。十三個章節主要是由 37 位學者所撰寫而成，分析氣候變遷的驅動力為何。重點則放在市場組織和消費。而氣候變遷主要的影響和因應的對策也是另外一個主題，重點放在不平等上。還有社會過程，包括公民社會、公共認知、組織性的拒絕氣候變遷等等。此外，各個章節也研究了社會學理論和方法上的創新。

對於要求要有更多的社會科學介入的聲音，該書有所回應，並且展現了社會學分析的獨特性。因為全球氣候變遷的的主要驅動力是鑲嵌在社會結構和制度、文化價值、意識形態之中的，所以全球暖化的分析是需要考慮到各個程度的社會過程的，從全球的層次到在地的層次。該書的第二目標是去刺激進一步社會學研究，涵蓋這個主題，因為社會學可以幫助理解氣候變遷，不僅僅是透過貢獻給已經存在的研究計畫或綱領，也可以奠基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上去提出新的研究問題。

社會學的角色也包括了提供社會批判。既有對於氣候變遷的分析總是侷限在近似霸權的想法上。例如，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年代，我們總是預設只有市場為基礎的政策才是可行的，才是可以減少碳排放量的，但是這個盲點侷限了行動的可能，所以社會學究可以在這點上面有所發揮的空間，超越單一向度、後政治的思考模式，質疑背後的預設，進而影響政策制定。

這種的氣候變遷公共社會學包括了紀錄達成顯著碳排放減量所面臨的困難 (若不是不可能性) 的同時也保持傳統的經濟成長。而社會學的發現可以促進對於氣候政策的公共辯論。開創一個知識的空間，好讓批判的觀點可以進來，那這是對我們的學科來說一個很大的幫助。我們希望全世界的社會學家可以加入 ASA 的這個專案小組，一起來努力！

來信寄給 Riley E. Dunlap <rdunlap@okstate.edu> 和
Robert J. Brulle <brullerj@drexel.edu>

> 印度的自由和暴力

議會政黨副主席 Rahul Gandhi和學生在Hyderabad大學，正值對Rohith Vemula的死所激起的抗議事件。2016年1月於Hyderabad。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要發表 ISA 的執行委員會的一篇聲明，以及另一篇由超過 200 為印度社會學家所撰寫的，並在 2016 年 3 月 6 日交給印度的總統。這篇聲明主要是抗議印度校園的暴力和學術自由的淪喪。即使是由事件所引發，但是卻有著歷史的重要性，因為表達了社會學家對於學術和社會的自由的深切關懷。

>ISA聲明：

我們是國際社會學會的執行委員會。我們和印度的學生、老師、作者、藝術家、運動者站在一起，共同為爭取言論自由和各項權利而奮鬥，抗議校園中越來越暴力的攻擊行為和右翼基本教義的歧視和暴力。我們特別關心對於弱勢群體的暴力攻擊和食物自由的侵害（被錯誤的認為是「禁止牛肉」）。

電子媒體有很大一部份被用來當作右翼民族主義的宣傳機器，系統性和暴力地針對知識分子、學生、運動者，這些違反倫理的報導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特別擔心。而從弱勢群體來的學生，特別是dalit-bahujan，是有特別急迫性的。

我們支持印度憲法所提出的多元觀點，拒絕任何宗教去框限這個國家。在一個反智的環境中，以及多數的攻擊事件都發生在校園內外的公共場域之中，我們作為專業社群一分子的可謂任重道遠。作為社會學者，我們深信放任這些壓制言論自由的事件發生，用 Amartya Sen 的話來說，就是一種對於不容忍的過度容忍。

我們要接下的聲明請願背書。那聲明是由印度超過 200 位社會學家所發起送交印度總統的，主要抗議對於社會學家的暴力攻擊，包括 Vivek Kumar 和 Rajesh Misra 教授，施暴者則是 Bharatiya Janata 政黨的學生支部。

大學是提供自由辯論和相互學習的空間，而近來發生在各大校園的暴力事件明顯了限縮了這樣的自由空間，特別是限制對 Hindutva 綱領的反對言論，這對支持言論學術自

>>

由的國際的社會學社群來說是個令人擔憂的事件。

而 2016 年 1 月 Hyderabad 大學社會科學博士生 Rohith Vemula 的自殺事件 (這也是這所大學的 dalit bahujan 的博士生的第 9 起自殺案件) 是肇因於他和其他四個人被從他所待的青年旅館趕出來後並且被排擠。這是一個深植於這個文化的歧視案例，雖然弱勢群體在校園中逐漸被看見，但是 Rohith Vemula 的死激起前所謂有的抗議浪潮，國內國外都是如此，特別是那些 dalit bahujan 的學生，因為他們所受到的歧視是最嚴重的。

我們支持印度各地的師生去質疑歧視和多數暴力，並在校園內外都推動反卡司特的哲學和社會世界，防止右翼的暴力攻擊。作家也是老師的 Perumal Murugan 被趕出家鄉到首都，這個經驗不是偶然。我們也欣慰看見像 Rohith 的年輕學者勇敢批評 Hindutva 政治，造成了很大影響，讓許多有創意的社會抗議接連興起。

我們支持 Jawaharlal Nehru 大學 (JNU) 的學生和老師對於這些暴力攻擊事件的抗議，並且支持對於複雜民族主義議題的公共辯論。我們珍惜他們在 Rohith Vemula 的基礎上所建立的信念，並且認為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學的一個象徵，質問學科邊界和高等教育制度內的排外主義，因此搭起學術和社會之間的橋樑。■

> 印度社會學家致印度總統的公開信

2016年3月4日

Shri Pranab Mukherjee
印度總統
RastrapatiNiwas
New Delhi

親愛的Shri Pranab Mukherjee：

我們是起草這篇聲明的社會學家，包括在職和退休的教師與研究者，來自全印度各個大學和研究機構。我們被近來持續發生的事件深深所干擾而不安，認為有必要發表這篇聲明。

印度的憲法保障所有的公民有權利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和和平表達信仰的訴求。我的強烈的呼籲大學和學術的自主性，並且這些地方是行使公民權利的重要場域。我們因此對學生、教師、職員近來所受到的攻擊感到擔憂，並且認為這些攻擊事件受到警方和政府的默許。學和老師受到惡劣的對待，攻擊，威脅，而施暴者卻似乎逍遙法外。

我們特別要表達們對於以下的人的支持：Vivek Kumar教授(JNU)和Rajesh Misra教授(Lucknow大學)，Kumar教授的演講(2月21日在Gwalior大學)被ABVP惡意的中斷； Misra教授也被ABVP 所威脅，且僅僅是因為一篇發表在臉書和報紙(2月23日)上的文章。而大學卻要他做出解釋，卻不去問施暴者為什麼施暴。

我們深深相信，學者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表達對社會議題的看法的自由。箝制學術自由是和國家利益相違背的，也戕害我們對於這個多元社會的理解與認識。我們再次重申，我們對於我們堅強的學術傳統有著很高的信任，多元的觀點不但深化了民族主義運動，也強化了印度的公共論述。■

> 學術研究寫作
邏輯與實做

by Raewyn Connell, University of Sydney, 澳洲, ISA女性與社會研究委員會委員(RC32)、概念與術語委員會委員(RC35)

馬太在天使的引導下寫福音。

> 迷思與現實

有兩個很大的迷思扭曲了我們對於寫作的想像，一個是舊的，一個是新的。舊的迷思把寫作視為是一種天賦和受到啟發的一件事情，某些天才早上坐在書桌前，拿著筆就文思泉湧，筆不停歇的開始寫作，沒有人知道這到底怎麼發生的。而我們能做的就是景仰，然後希望謬思女神某天也附身我們。

新的迷思沒那麼詩意。其來自於心自由主義的管理者的腦中，反應了其對於競爭的迷戀。這個迷思認為寫作不過就是一種市場上的商品，賣的就是作者嘔心瀝血的文字。最好的利潤，就是名聲和升遷，而且必須發表到引用點數很高的期刊上。

兩個迷思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現實，但不是總是這樣子的。寫作大部份的時候的確是一個人用筆或電腦前後斟酌、反覆修改其想法而成的。而且越來越必須要發表到競爭性高的商業化期刊中。

但是，上述兩個迷思也扭曲了寫作的真實面貌。兩者所重視的個人天賦或是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一種社會過程。兩者都忽視了一個很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寫作其實是一種對話。兩者也都忽視了研究寫作是一種集體創造和散佈知識的過程。

不論在社會學或是其他學科中，寫作都很重要，特別是因為寫作是整個集體知識創造和傳佈的核心。許多在年輕學者看來很武斷的學術寫作特徵都要放在這個脈絡下才得以可能理解。

寫作的政治也唯有在思考了寫作相關社會制度和結構後才可以被理解，包括了「排名表格」的影響和期刊商業化，知識生產者的不穩定勞動問題，國際的排名階層，名聲，資源，網際網路的使用和風險，知識形成和傳佈的民主化過程。

> 寫作的取徑

關鍵在於把寫作視為是一種社會勞動。這是一項工作，而且我們可以展現這如何可能，即使在最傑出的文本中也是可以的。我們若從工業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學術寫作，會很有幫助，也讓我們去思考這之中涉及的勞動力，像是結構組成、工資、勞動條件、技術、資源、監督、自主。

寫作當然是一種專門化的勞動形式，特別是一種溝通工作， 所以也可以從溝通社會學來看。這讓我們去思考讀者的面向，怎麼接觸到讀者，寫作對讀者意味著什麼。很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要想是寫給誰看的，這決定的寫作本身。

學術研究寫作是一種特別的溝通形式，這點也很重掉，因為寫作是知識生產集體過程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從知識分子和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該領域在後殖民時期被重新塑造了)。作者和之前與未來知識生產者的關係是很重要的，並且知識與認識架構也很重要。

>>

有了這樣的背景，我們可以不用把寫作看成是迷般的東西，而是一種勞動過程。不同的體裁有不同的讀者和風格。而像其他的勞動形式一樣，寫作包括了可以學習和精進的技巧，也包括了創意和目的性的元素。

過去 12 年來，我在許多大學和會議中舉辦了許多寫作工作坊。這不是在教怎麼寫好文章發表到好的期刊。恰恰相反！我就是要傳達上述所說的，寫作是一種社會、合作的過程，而且寫作是整個知識生產的核心。

> 研究寫作的簡短綱要

在過去幾個月以來，我從工作坊中精鍊出一寫想法，並在部落格上發表，現在我集結這些文章成冊，透過創用 CC 發行電子書。

該書稱作《Writing for Research: Advice 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有 42 頁 (包括圖解)，可以從網路上下載：http://www.raewynconnell.net/p/writing-for-research.html。很歡迎各位下載，傳播，都是免費的，沒有任何商業目的。

該書討論寫作和體裁，期刊論文寫作的實際考量，個人寫作經驗，以及寫作的政治。目錄的大綱如下：

第一部份：關於寫作

1. 寫作的本質
2. 研究對話，社會現實
3. 研究寫作的體裁

第二部份：怎麼寫期刊文章：實際步驟

摘要；論點大綱；初稿；修改；簡報；出版

第三部份：大的圖像

1. 寫作計畫
2. 為什麼寫作？值得寫作嗎？
3. 資源

我鼓勵其他有經驗的研究者也分享其實做和反思，幫助建立更好的理解。最後我也歡迎任何意見和指教。

來信寄給 Raewyn Connell <raewyn.connell@sydney.edu.au>

James Joyce的《尤理希斯》的原稿。

> 介紹哈薩克團隊

《全球對話》的哈薩克團隊在2015年於Aigul Zabirova的帶領下成立了。這個團隊有著堅強的決心將《全球對話》傳播到哈薩克的各個角落，並且克服了翻譯的挑戰。

Aigul Zabirova 是 L.M. Gumilyov 歐亞國立大學 (Euras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stana) 的社會學系創系系主任和教授。她在 Moscow 唸書，2004 年從俄國科學學院的社會學研究所到博士學位，目前的研究包括了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的家庭的社會經濟狀況。她 也 是《When Salary is not enough: Private Households in Central Asia》(Verlag, 2015/05) 一書的作者。她教很多課程，涵蓋都市社會學和社會理論。其研究和寫作主要是後蘇聯時代的認同政治，中亞的都市化、遷徙等。其到過許多國際獎項和獎助，像是 MacArthur 基 金 會 (2000-01, 2002-03), INTAS (2005-07), TACIS (2007), Volkswagen 基 金 會 (2011-13), Open Society Institute (2001-03), Central European 大學 (2001, 2008)，還有哈薩克科學部的獎項。她也曾是在倫敦亞非學院 (英國 , 2011)，Lund 大學 (瑞典 , 2008), Warwick 大學 (英國 , 2007), Indiana 大學 (美國 , 2002) 等擔任過研究員。她從 2010 年開始是 ISA 的會員。

Bayan Smagambet 是歐亞國立大學社會系的副教授。她在 Almaty 唸書，並且在 1998 年從 Al-Farabi Kazakh 國立大學得到社會學的科學候選人資格。她教授社會學史和經濟社會學。其研究興趣包括了社會不平等，勞動市場。她發表了許多教科書，包括社會學史、經濟社會學、社會史，也出版了約 20 篇論文。

Adil Rodionov 是歐亞國立大學的社會系講師。他也是智庫「歐亞整合學院」工作。他在 2009 年獲得該校的社會學博士。他曾經在 Central European 大學 (Budapest, 匈牙利 , 2013-14) 擔任研究員。其研究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公民社會、社會科學的歷史。他現在的計畫主要是探討哈薩克非營利組織的網絡，其計畫的簡介位於：http://e-valuation.kz/social_capital_en.html

Gani Madi 是歐亞國立大學的社會系教師，並且也在 2010 年於該校獲得碩士學位。他教授理論社會學、結構和階層社會、經濟社會學、精英、遷徙社會學、社會學導論。他現在對於工作場所的權力動態和勞動的管理控制，以及馬克思理論有興趣。